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四辑）

AESTHETIC

美学原理

〔意〕克罗斯(B. Croce)著 D. Ansleyuan 原译 朱光潜 重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主编 李天纲
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哲学（第四辑）

AESTHETIC

美学原理

〔意〕克罗斯（B. Croce）著

D. Ansleyuan 原译 朱光潜译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美学原理/李天纲主编.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7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 哲学)

ISBN 978-7-5520-1753-3

I. ①美… II. ①李… III. ①美学理论 IV. ①B83-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106号

美学原理

主 编: 李天纲

编 纂: 赵 炬

责任编辑: 唐云松

特约编辑: 陈宁宁

封面设计: 清 风

策 划: 赵 炬

执 行: 取映文化

加工整理: 嘎 拉 江 岩 牵 牛 莉 娜

责任校对: 笑 然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 上海三联读者服务合作公司

印 刷: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0×900毫米 1/16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23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20-1753-3/B.163

定价: 88.00元 (精装)

民国西学：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

——『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序

李天纲

继唐代翻译印度佛经之后，二十世纪是中文翻译历史上的第二个高潮时期。来自欧美的『西学』，以巨大的规模涌入中国，参与改变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这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是罕见的。域外知识大规模地输入本土，与当地文化交换信息，激发思想，乃至产生新的理论，全球范围也仅仅发生过有数的那么几次。除了唐代中原人用汉语翻译印度思想之外，公元九、十世纪阿拉伯人翻译希腊文化，有一场著名的『百年翻译运动』之外，还有欧洲十四、十五世纪从阿拉伯、希腊、希伯来等『东方』民族的典籍中翻译古代文献，汇入欧洲文化，史称『文艺复兴』。中国知识分子在二十世纪大量翻译欧美『西学』，可以和以上的几次翻译运动相比拟，称之为『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并不过分。

运动似乎是突如其来，其实早有前奏。梁启超（1873-1929）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广译算学、天文、水利诸书，为欧籍入中国之始。』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徐光启、李之藻等人发动的明末清初天主教翻译运动，比清末的『西学』早了一百多年。梁启超有所不知的是，利、徐、李等人不但翻译了天文、历算等『科学』著作，还翻译了诸如亚里士多德《论灵魂》（《灵言蠡勺》）、《形而上学》（《名理探》）等神学、哲学著作。梁启超称明末翻译为『西学东渐』之始是对的，但他说其『范围亦限于天（文）、（历）算』，则误导了他的学生们一百年，直到今天。

从明末到清末的『西学』翻译只是开始，而且断断续续，并不连贯成为一场『运动』。各种原因导致了『西学』的挫折：被明清易代的战火打断；受清初『中国礼仪之争』的影响；欧洲在1773年禁止了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以及儒家保守主义思潮在清代的兴起。鸦片战争以后很久，再次翻译『西学』，仍然只在上海和江南地区。从翻译规模来看，以上海为中心的翻译人才、出版机构和发行组织都比明末强大了，影响力却仍然有限。梁启超说：『惟（上海江南）制造局中尚译有科学书二三十种，李善兰、华蘅芳、赵仲涵等任笔受。其人皆学有根底，对于所译之书责任心与兴味皆极浓重，故其成绩略可比明之徐、李。』梁启超对清末翻译的规模估计还是不足，但说『戊戌变法』之前的『西学』翻译只在上海、香港、澳门等地零散从事，影响范围并不及于内地，则是事实。

对明末和清末的『西学』做了简短的回顾之后，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二十世纪的中文翻译，或曰中华民国时期的『西学』，才是称得上有规模的『翻译运动』。也正是在二十世纪的一百年中，数以千计的『汉译名著』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教材。1905年，清朝废除了科举制，新式高等教育以新建『大学堂』的方式举行，而不是原来尝试的利用『书院』系统改造而成。新建的大学、中学，数理化、文史哲、政经法等学科，都采用了翻译作品，甚至还有西文原版教材，于是，中国读书人的思想中又多了一种新的标杆，即在『四书五经』之外，还必须参考一下来自欧美的『西方经典』，甚至到了『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

我们在这里说『民国西学』，它的规模超过明末、清末；它的影响遍及沿海、内地；它借助二十世纪的新式教育制度，渗透到中国人的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中，这些结论虽然都还需要论证，但从一般直觉来看，是可以成立的。中国二十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及『现代化』、『世俗化』、『理性化』，都与『民国西学』的翻译介绍直接有关。然而，『民国西学』到底是一个多大的规模？它是一

个怎样的体系？它们是以什么方式影响了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这些问题都还没有得到认真研究，我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还有，哪些著作得到了翻译，哪些译者的影响最大？『西学东渐』的代表，明末有徐光启，清末有严复，那『民国西学』的代表作在哪里？这一系列问题我们并不能明确地回答，原因就在我们对民国翻译出版的西学著作并无一个全程的了解，民国翻译的那些哲学、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的『西学』著作，束之高阁，已经好多年。

举例来说，1935年，上海生活书店编辑《全国总书目》，『网罗全国新书店、学术机关、文化团体、图书馆、政府机关、研究学会以及个人私家之出版物约二万种』。就是用这二万种新版图书，生活书店编制了一套全新分类，分为：『总类、哲学、社会科学、宗教、自然科学、文艺、语文学、史地、技术知识』。一瞥之下，这个图书分类法比今天的『人大图书分类法』更仔细，因为翻译介绍的思潮、学说、学科、流派更庞大。尽管并没有统一的『社科规划』和『文化战略』，『民国西学』却在『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查看《全国总书目》（上海，生活书店，1935），在『社会科学·社会学一般·社会主义』的子目录下，列有『社会主义概论、社会主义史、科学的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乌托邦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议会派社会主义』等；在『社会科学·政治·政体政制』的子目录下，列有『政治制度概论、政治制度史、宪政、民主制、独裁制、联邦制、各种政制评述、各国政制、中国政制、现代政制、中国政制史』等，翻译、研究和出版，真的是与欧美接榫，与世界同步。1911年以后的38年的『民国西学』为二十世纪中国学术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我们却长期忽视，不作接续。

编辑出版一套『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把中华民国在大陆38年期间翻译的社会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著作重新刊印，对于我们估计、认识和研究『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中国的文艺复兴』，接续当

时学统，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1980年代初，上海、北京的学术界以朱维铮、庞朴先生为代表，编辑『中国文化史丛书』，一个宗旨便是要接续1930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中国文化史丛书』，重振旗鼓，『整理国故』，先是恢复，然后才谈得上去超越。遗憾的是，最近三十年的『西学』研究却似乎没有采取『接续』民国传统的方法来做，我们急急乎又引进了许多新理论，诸如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还有『老三论』、『新三论』、『后现代』、『后殖民』等等新理论，对『民国西学』弃之如敝屣，避之唯恐不及。

民国时期确实没有突出的翻译人物，我们是指像严复那样的学者，单靠『严译八种』的稿酬就能成为商务印书馆大股东，还受邀担任多间大学的校长，几份报刊的主笔。但是，像王造时（1903-1971）先生那样在『西学』翻译领域做出重要贡献，然后借此『西学』，主编报刊、杂志，在『反独裁』、『争民主』和『抗战救国』等舆论中取得重大影响的人物也不在少数。王造时的翻译作品有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摩瓦特的《近代欧洲外交史》、《现代欧洲外交史》、拉铁耐的《美国外交政策史》、拉斯基的《国家的理论与实际》、《民主政治在危机中》。1931年，王先生曾担任光华大学教授，文学院院长，政治系主任，后来创办了《主张与批评》（1932）、《自由言论》（1933），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2）。他在上海舆论界发表宪政、法治、理性的自由主义；他在大学课堂上讲授的则是英国费边社社会主义、工联主义和公有化理论（见王造时著《荒谬集·我们的根本主张》，1935，上海，自由言论社）。非常可惜的是，王造时先生这样复杂、混合而理想主义的政治学理论和实践，在最近三十年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中并无讨论，原因显然是与大家不读，读不到，没有再版其作品有关。

我们说，『民国西学』本来是一个相当完备的知识体系，在经历了一个巨大的『断裂』之后，学者并没有好好地反省一下，哪些可以继承和发展，哪些应该批判和扬弃。民国时期好多重要的翻译著作，我

们都没有再去翻看，认真比较，仔细理解。『改革、开放』以后，又一次『西学东渐』，大家只是急着去寻找更加新颖的『西学』，用新的取代旧的，从尼采、弗洛伊德……到福柯、德里达……就如同东北谚语讽刺的那样：『熊瞎子掰包谷，掰一个丢一个。』中国学者在『西学』宝库中寻找更新式的装备，在层出不穷的『西学』面前特别害怕落伍。这种心态里有一个幻觉：更新的理论，意味着更确定的真理，因而也能更有效地在中国使用，或者借用，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种实用主义的『西学观』，其实是一种懒惰、被动和浮躁的短视见解，不能积累起一个稍微深厚一点的现代文化。

讨论二十世纪的『西学』，一般是以五四『新青年』来代表，这其实相当偏颇。胡适、陈独秀等人固然在介绍和推广『西学』，倡导『启蒙』时居功至伟，但是『新文化运动』造成不断求新的风气，也使得这一派的『西学』浅尝辄止，比较肤浅，有些做法甚至不能代表『民国西学』。胡适先生回忆他们举办的《新青年》杂志，有一个宗旨是要『输入学理』，即翻译介绍欧洲的社会科学、人文学科知识，他还大致理了一个系统，说『我们的《新青年》杂志，便曾经发行过一期『易卜生专号』，专门介绍这位挪威大戏剧家易卜生，在这期上我写了首篇专论叫《易卜生主义》。《新青年》也曾出过一期『马克思专号』。另一个《新教育月刊》也曾出过一期『杜威专号』。至于对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日耳曼意识形态、盎格鲁·萨克逊思想体系和法兰西哲学等等的输入，也就习以为常了。』（唐德刚编译：《胡适口述自传》，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91页）。胡适晚年清理的这个翻译目录，就是那一代青年不断寻找『真理』的轨迹。三四十年间，他们从一般的人性论学说，到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从不列颠宪政学说，到法兰西暴力革命理论、德意志国家主义思想，再到英格兰自由主义主张，大致就是『输入学理』运动中的全部『西学』。

胡适一语道破地说：『这些新观念、新理论之输入，基本上为的是帮助我们今日所面临的实际

问题。』胡适并不认为这种『活学活用』、『急用先学』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接受『西学』的方法论，大多认为翻译为了『救国』，如同进口最新版本的克虏伯大炮能打胜仗，这就是『天经地义』。今天看来，这其实是一种庸俗意义的『实用主义』，是生吞活剥，不加消化，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简单思维，或曰：是『夺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从我们收集整理『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的情况来看，『民国西学』是一个比北大『启蒙西学』更加完整的知识体系。换句话说，我们认为『五四运动』及其启蒙大众的『西学』并不能够代表二十世纪中国西学翻译运动的全部面貌，在大的『启蒙西学』之外，还有上海出版界翻译介绍的『民国西学』。或许我们应该把『启蒙西学』纳入『民国西学』体系，『中国的百年翻译运动』才能得到更好的理解。

我们认为：中国二十世纪的西学翻译运动，为汉语世界增加了巨量的知识内容，引进了不同的思维方式，激发了更大的想象空间，这种跨文化交流引起的触动作用才是最为重要的。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化变得不古不今，不中不西，并非简单的外来『冲击』所致，而是由形形色色的不同因素综合而成。外来思想中包含的进步观点、立场、方案、主张、主义……具有普世主义的参考价值，但都要在理解、消化、吸收后才能成为汉语语境的一部分，才会有更好的发挥。在这一方面，明末徐光启有一个口号可以参考，那便是『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必先翻译』。反过来说，『翻译』的目的，是为了中西文化之间的融会贯通，而非搬用；『会通』的目的，不是为了把新旧思想调和成良莠不分，而是一种创新——『超胜』出一种属于全人类的新文明。二十世纪的『民国西学』，是人类文明的一个环节，值得我们捡起来，重头到底地仔细阅读，好好思考。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邀我主编『民国西学要籍汉译文献』，献弁言于此，是为序。

〔意〕克羅斯（B.Croce）著 D.Ansleyuan 原譯 朱光潛重譯

美學原理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初版

譯者序

我起念要譯克羅齊的「美學」遠在十五六年以前，因為翻譯事難，一直沒有敢動手。這十五六年中我卻寫過幾篇介紹克羅齊學說底文章，事後每發見自己有誤解處，恐怕道聽途說，以訛傳訛，對不起作者，於是決定把「美學」翻譯出來，讓讀者自己去看法作者的眞面目。

「美學」是克羅齊的第一部著作，它所討論底不僅是普通底美學問題，尤其是美學在整個哲學中底地位，審美底活動與其它心靈活動的分別和關係。克羅齊對於哲學自有一個系統，美學在這個系統裏只是一個項目。他寫完「美學」以後，繼續寫了三部書——「邏輯學」、「實用活動的哲學」、「歷史學」——纔把他所謂「心靈的哲學」全部和盤托出。不過後來底三部書的要義都已在「美學」裏約略提及。所以「美學」這部書含有他的全部哲學的雛形，不能只當作一部專講美學底書去看。因為這個緣故，要瞭解他的美學，不能不先瞭解他的全部哲學。我原來要作一篇論文，介紹他的全部哲學，作為這部譯文的序論。可是這篇論文寫得很長，頗有喧賓奪主之勢，於是把它單成一本書，叫做「克羅齊哲學述評」，讀者最好先看這本書，再看譯文。

克羅齊的文章有極端底邏輯底謹嚴性，意思表達到恰能明白為止，不再去發揮，也不講究詞藻的修飾，所

以表面看起來像很乾枯，有時像過於簡略，沒有一般寫藝術問題底文章那麼「美。」其實這正是上品底哲學文字，它的好處在精確不支蔓。讀這種文章，如同讀亞理斯多德和康德的文章一樣。當然很費力；惟其要費力，讀者就要讀一句，想一句，不能走馬看花，或是只被動地接受，所以費力有費力的收穫。

我普通自己寫文章，以流暢親切為主，翻譯這書時卻不得不改變自己的作風以求對於作者忠實，我起稿兩次，第一次全照原文直譯，第二次騰清，丟開原文，把文字順中文的習慣略改得順暢一點。我的目標是：第一不違背作者的意思，第二要使讀者在肯用心求瞭解時能夠瞭解。我說「在肯用心求瞭解時，」這插句很重要，因為我的譯文是可瞭解底，而卻不是不用心就能瞭解底，原文本來也就如此。我可以告訴讀者，我翻譯時，沒有一句話我沒有懣清意思而就隨便譯出來，也沒有一個意思我沒有找到我認為恰當底字句而就隨便表達出來。生硬在所不免，不可瞭解底地方或許沒有。

因為原文太簡，有時援引中國讀者所不很熟悉底學說或典故，所以我在譯文之後附着簡明底註釋。我以為譯學術著作，必須有註釋。在西方學術界譯文加詳註是常事，我希望這個很好底習慣在中國流行。

原書分理論與歷史兩部分。我只譯了原理部分。這並非說歷史部分不重要，我不譯底原因是作者所討論底學說在西方雖是一般學者所知其梗概底，在中國則全是陌生底。他對於每個學說雖說得很扼要，卻也說得很簡略，照文直譯，一般中國讀者決不能瞭解；若加註釋，恐怕須比原文長兩三倍，看起來難免太乾燥。還有一層，

克羅齊寫美學學說史，完全照他的直覺即表現那個觀點出發，與他的學說無關底一概從略。所以「美學」的歷史部分不能當作一般底美學史去看，對於初學者沒有多大用處。

我根據底本子是昂斯勒（Douglas Ansie）的英譯本，譯時參照意大利原文本第五版。對照時我發見英譯常有錯誤或不妥處，原因是譯者的哲學訓練不太夠，而且他根據修正底是原文第四版（一九〇九年版）。克羅齊在第五版（一九二二年版）裏略有更正。本書在中國早有傅東華先生的譯本，我也對照過。他完全根據英譯，英譯的毛病他的譯本未能免除。他的努力值得我們欽佩，我再譯這書，並非敢希望我能比他譯得較好，而是因為好書應該多有幾個譯本，以便讀者參校。

繆朗山先生有時幫助我解決意大利文的困難，張真如賀自昭鄭秉璧三位先生替我審閱過譯稿，我特別向他們致謝。

三十六年二月北平 朱光潛

作者原序

一

本書包含理論部分和歷史部分，兩部分各可獨立而卻互相補充。

理論部分的核心原是一篇備忘錄，題目是「作為表現的科學和普通語言學底美學，它的基本底原理。」一九〇〇年二月十八日到五月六日那一學期在納布爾斯的彭塔仰納學院宣讀過，在那學院的學報第三十卷裏發表過。作者現在沒有加多少重要底修改，不過在重新寫過時，增加和補充了一些話，和從前那本備忘錄的章次也略有不同，用意是使敘述比較明白易懂。歷史部分只有頭五章在納布爾斯一家刊物叫做「佛來格里」底發表過，題目是「維柯，美學的首創者。」這幾章也擴充過，和其餘歷史部分諸章弄成一致。

作者討論到，尤其在理論部分，對於他所研究底原理僅為旁支底一些普通問題。但是這並不算是題外話，如果人們記得：嚴格說起，諸哲學底科學沒有獨立自足底。哲學是一個整一體，我們研究美學，邏輯學，或倫理學時，總是研究哲學全體。雖然為着教導的方便，只說明那不可分底整一體的某一面。因為哲學的一切部分互有

這種密切底關係，對於審美底活動，表現底和創造底想像，心靈活動的第一胎嬰兒，而且是此外諸心靈活動的基礎——若是茫然而且誤解，則在心理學和邏輯學，歷史學和實用哲學各方面，也就到處發生茫然，誤解，錯誤諸現象。語言既是最初底心靈底表現，審美底形式既是語言本身，則心靈生活的較後起較複雜底方面無望瞭解清楚，如果它們的初步底單純階段被誤解，割裂，和變形了。要把審美底活動說明白，纔可望修正一些概念，解決一些哲學問題，這些通常像弄得糾纏不清。本書就是存這個意旨寫成底。如果這個企圖以及附帶底歷史底闡述，因為掃除障礙，指出應走底路徑，對於吸行學者們從事於這種研究有一點用處，如果這事能實現，尤其是在意大利，她一向有很高貴底美學的傳統，作者就可認為他的目的已達到，而他的一個懇切底願望也就已得到滿足了。

納布爾斯 一九〇一年十二月

一一一

除掉細心修改文字之外（在這上面，和在修正註釋上面，我得到我的朋友佛斯陀，尼柯里麗的有價值底幫助，）我在這第三版作了一些理論方面的修正，尤其在第十章和第十一章，這是由進一步底思索和自我批評來底。

但是我沒有加入一些修正和補充以至改變本書的原來計畫，這計畫是，或則說原意是一個完備而簡短底美學底學說，嵌在一個心靈哲學綱要的架子裏。

讀者如果要知道普通底或相關底原理的完備底敘述，或是關於哲學的其它部分的較詳細底闡明（例如藝術的抒情性），現在可以參看「邏輯學」和「實用哲學」兩部書，這兩部書加上本書組成「心靈的哲學」這在作者看，已窮盡哲學的整個範圍了。這三部書不是同時想好，同時寫成底；如果是，有一些細目的安排會不同。我寫第一部書時，沒有想到要寫其餘兩部，像我現在所寫成底，所以我把它看成獨立自足，我已經說過。其次，據現在美學研究的情形看，宜於在理論的闡明之後附加一部較完備底美學史；而在其它部分哲學，我僅給了一些簡短底歷史底註釋，只是要使人明白，從我的觀點，這種歷史最好應該怎樣寫。最後，在對於各種哲學底科學作過有系統底敘述以後，我現在對於許多事情看出較密切底關係，看得比較清楚，至少是看得和從前不同；「美學」中偶爾有一些猶豫，一些原理上底錯誤，尤其是在討論到不關美學本身底題材時，現在就無可辯護了。爲了這些緣故，這三部書雖是在精神與目的上大體一致，卻各有各的面貌，現出不同時代寫作的痕跡，因此它們應依出版先後順序排列，也應順序詮釋。

關於美學的次要問題，以及對於我的學說所曾加或所可加底非難，我已經並且還要繼續在專門論文裏討論，這些論文我不久要結集出版，作爲本書的一種註釋底和辯論底附錄。

一九〇七年十一月

三

爲發行第四版而修改本書，我趁機會宣告前次所說底補充論文已在一九一〇年出版，題目是「美學問題和對於意大利美學史的貢獻。」

一九一一年五月

四

本書第四版的大量底印行使我可以停了十年左右纔再來印它。在這第五版中，像從前在第四版中一樣，我沒有加重要底更改，只加了一些瑣細底闡明和文字的改動，使文章更明白一點。爲着證實在三版序文裏所說底話，我再寫了一部「歷史學」，作爲「心靈的哲學」第四部，來討論關於一般哲學思想底問題；至於關於專屬美學範圍底問題，在一九一一年的「美學問題」一書之外，我又寫了一部「美學新論文」，這是去年結集成書底，這包含我對於本題底最後底較成熟底思想，同時把在本書還是不準確底，未發揮底或錯誤底一些論點加以闡明和修正。「新論文」也並不能取消本著，而是根據它加以評註，在幾個論點上加以重新整理，並